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QUANMIAN SHENHUA GAIGE YANJIU

杨海英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QUANMIAN SHENHUA GAIGE YANJIU

杨海英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杨海英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
ISBN 978-7-300-22812-9

I. ①全… II. ①杨… III. ①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350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
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杨海英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2.2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6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改革的历史演进	1
一、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	1
二、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展开阶段	4
三、制度初步建立阶段	8
四、制度趋向完善阶段	12
五、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16
第二章 改革的经验总结	22
一、始终确保正确的改革方向	22
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27
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31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6
第三章 改革的战略定位	40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源	40
二、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保障	45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49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54
 第四章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58
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59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3
三、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辩证关系	68
四、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彰显了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	72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	 75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滋养	75
二、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	80
三、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84
四、增强思维能力	88
五、紧紧依靠人民	93
 第六章 经济体制改革	 96
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96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03
三、努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106
四、积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119
 第七章 政治体制改革	 121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121
二、推进人民有序参与政治发展进程	124
三、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125
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127
五、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	129

第八章 文化体制改革	133
一、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133
二、推进管办分离，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138
三、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144
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48
第九章 社会体制改革	154
一、社会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	154
二、社会体制改革的特征、框架与任务	159
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164
第十章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171
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与目标任务	171
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	177
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	181
四、积极借鉴有益经验	185
后 记	189

第一章 改革的历史演进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革命。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展至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直到进入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为更清晰地理清这段历史，我们大体可以把中国改革的历史演进分为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展开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春）、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春至2002年11月）、制度趋向完善阶段（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五个历史阶段分析。

一、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被从危难中挽救了回来，但长达十年的“文革”遗留下来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混乱仍然存在，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方针、政策还未根本扭转。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指明发展方向，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召开前夕，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言。邓小平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老一辈革命家的发言和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突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推动中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即将启动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思想是一切行动的先导，如果在思想上守旧、僵化，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裹足不前。“文革”结束后，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遭到广大干部群众의强烈反对，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群众的共鸣。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批判。全会公报引用邓小平的话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全会还提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努力，从根本上为改革解除了思想束缚，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全会认为，中央自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基本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讨论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问题，推动改革率先在农村实现了突破。全会讨论了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计划安排，提出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为调动农民积极性，全会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的“左”的错误，经过修改完善之后，这个文件在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开始对过于集中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这个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①在中央的大力推动和鼓励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各地纷纷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②这就打破了人民公社的过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农村经济生活开始红火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而复杂，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就难免在改革初期会遇到各种疑问、质疑，甚至批评。如何打消人们思想上的顾虑，形成改革共识，保证改革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向顺利前进，是党和国家“掌舵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会不会在农村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有老同志在中央会议上指出，如果越来越贫穷，那我们为什么干革命？针对有人质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搞资本主义，担忧资本主义进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③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8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③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策的正确性，为最初几年在农村引起的巨大变化所证明。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1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38.3%；城乡储蓄余额达到6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① 1979—1984年，农业增加值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速，分别由1958—1978年的1.4%提高到7.3%，由1.2%提高到9.5%。这些数据表明，中央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也是成功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② 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稳定了国民经济，提高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初步积累了一些改革的成功经验，为下一步的城市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展开阶段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农村改革积累了一定经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不仅制定了当时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还提出了一系列对今天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首次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9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②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段话反映了邓小平对长期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曾经发生过把外国经验、外国模式视作完全正确、不容置疑的东西而照搬照抄，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今，我们的改革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学习借鉴而不盲从，提高走自己的道路的理论自觉，这对我国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都有着指引航向的作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重要源头。

二是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一词原出自我国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意指人民生活幸福的理想社会。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②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对“小康社会”做了具体描述：“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③党的十二大把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写入了大会文件。自此，“小康社会”就成了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必然提及的关键词。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仍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如果说改革初期我们党在做出改革决定时还是把改革看作一场很大的试验的话,那么党的十二大以后,较之以前就有了更多的自信和勇气,对我们要走的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设计。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继续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开始逐步扩大城市经济改革的试点工作,改革的重点开始向城市转移,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也要前进一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些理论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如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等。在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以后,农民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些“剩下的”农产品能否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即让它们变成商品,就成了一个新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相关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何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更加深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确保党的十二大提出的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能够实现,就成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任务。

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做了总结,阐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要改革僵化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这个《决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

总体来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有两大贡献。第一,从理论上看,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为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解除了思想认识上的束缚,起到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良好作

用。邓小平曾对此高度评价道：“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① 第二，从实践上看，全会针对城市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具体措施，提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同时，在把农村经验运用到城市中来的时候，必须考虑城市企业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农村的具体做法。由于行业性质、企业规模和生产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企业实行责任制也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模式。这就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从此之后，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展开阶段。

实践证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我国的改革事业是卓有成效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得到很大改变。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第四，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此外，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见，这一时期的改革虽然是以城市为重点，但实际上整个经济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已经展开，并推动了科技、教育、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一场很大的试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时，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实践表明，推进改革才能更好地破解难题。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把“加快和深化改革”作为中心任务，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在对我国基本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此后，经过1988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始对经济的治理整顿，特别是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我国经济秩序更加稳定，改革步调有条不紊。

三、制度初步建立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的“多事之秋”。在经历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开始转好之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改革把苏联送进了坟墓，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一时之间，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的抨击、污蔑甚嚣尘上，似乎只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潮流”。反映到国内，一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所怀疑，担心我们的改革会步苏联后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打消思想上的疑虑，就成了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并于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

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②“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③这就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纠正了一些人对改革的错误观点和怀疑情绪，极大地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回答了当时困扰人们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如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姓资姓社的问题，等等。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他进一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他的这些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理论贡献。这些论述统一了思想认识，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还要求加快改革步伐，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⑥这些鼓励对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深入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关乎中国改革进程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的这些谈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对于帮助全党统一认识，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事业才得以顺利推进。关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同上书，367页。

③ 同上书，370～371页。

④⑤ 同上书，373页。

⑥ 同上书，372页。

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① 因此，人们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视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份宣言书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九个方面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决定将这一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党的十四大的另一突出贡献是，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② 由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那里已经得到了解决，党的十四大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这又是一项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才能真正起到对中国改革的指导作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全会首先分析了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我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正在转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广泛展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 and 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以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 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抓住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全会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会还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② 不难看出，这个决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全面、系统、具体，为实现我国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顺利过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又做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和部署。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议》还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确定为：到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了“从现在起到下世纪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19～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② 同上书，520～521页。